



Studies of Global History  
&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  
全球史與東亞文化交涉研究叢書

主編 李雪濤 沈國威

# 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

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

沈国威  
编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Studies of Global History  
&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  
全球史與東亞文化交涉研究叢書

主編 李雪濤 沈國威

沈國威  
編著

# 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

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 /  
沈国威编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全球史与东亚文化交涉研究丛书)  
ISBN 978-7-5675-9689-4

I. ①汉… II. ①沈… III. ①汉语—词汇—研究—近代  
IV. ①H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97819号

## 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 ——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

编 著 沈国威  
责任编辑 曾 睿  
审读编辑 李潇潇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冯逸琚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印 张 20.25  
字 数 345千字  
版 次 2019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0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9689-4  
定 价 68.00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先秦儒者、古希腊哲人直面天地大块，思索无极自然。东贤西哲虽相隔万里，所论却似曾相识。此丛书的标志预示着“全球史与东亚文化交涉研究丛书”将冲破民族国家的藩篱，从互动中来理解历史，从更加广阔的视域，探寻东西文明间的互动与共生规律。

Despite the geographic distance, the philosophies of ancient China and Greece present similar views on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cosmos. This implies that any approach to a historiography of all civilizations naturally spans all geographical and political borders. Our Studies of Global History and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s Series takes readers on an intellectual journey across East Asia and beyond. Each volume is placed in an historical context that emphasizes the ideals of East-West interactions. Thus, the logo expresses exactly our attempt to draw a new outline of history as a continuous change emanating from inter-and transnational correlations.

—

跟以往分裂来研究世界各个部分以及不同领域的世界史相比,全球史研究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以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全球史学科的观念,同时也打破了在东亚史和世界史之间的学科界限,从而将东亚历史纳入到全球史之中进行整体研究。

大航海以来,欧洲习惯于将自身的利益通过国家或宗教的意识形态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是现代性的一个特点,同时也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贸易。世界贸易体系的形成,使得世界资源得以重新分配,欧洲的技术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民族国家的形成,使得西方国家通过签订各种合约确定主权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对于以欧洲为中心的殖民扩张来讲,世界仅仅是一个海外的存在而已。全球史学科的建立,在于以跨文化互动的发展,来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论点。以往以欧洲的历史经验作为其他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尺的做法,已经被当今学界所摒弃。作为全球史之父的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 1917—2016)认为,“与外来者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sup>①</sup>,因为特别是与异质文化的接触与交往,往往会引起对很多约定俗成惯例的调整和改变。历史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与外来者的交往而引发的,也正是这一动力,推动着欧亚共生圈(ecumene)的形成和发展。霍奇森(Marshall G. S. Hodgson, 1922—1968)甚至认为,“西欧的演变取决于欧亚非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过程”<sup>②</sup>。

全球史的理念超越了以往人们看待世界和空间的方式。

① 麦克尼尔著《变动中的世界历史形态》,载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1页,此处见第45页。

② 霍奇森著《历史上各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载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43页,此处见第43页。

尽管现代性产生于西方,但却是在西方与其他异质文明的接触中产生的。芝加哥大学的德裔欧洲史教授盖耶(Michael Geyer, 1947—)和芝加哥的另一位历史学家布莱特(Charles Bright)甚至认为,“作为一种反作用力,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非西方国家,才是产生全球一体化的力量源泉,正是它们在一体化进程中让世界逐渐融合,而世界各地的历史也因此同世界历史产生了关系”<sup>①</sup>。

作为方法论和研究领域的全球史实际上是一个上位的概念,也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广阔学术空间,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穷尽这之中的所有学问。目前我们仅仅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全球史与东亚的各个研究领域的成果进行整合,以期能够出现一些全球史与东亚的研究新成就。全球史与东亚文化交涉研究这一题目,并非某一学科的某一人可以从事的专业,它必然是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学者积极参与及密切互动的结果,同时它也必然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初见成效。

## 二

东亚文化交涉学是关西大学研究团队提出的重要学术概念。之所以使用“交涉”,而不是“交流”,是团队将自己的研究特色定位于:越境、互动、周边和中心的互视。2007年6月,关西大学历史、思想史、东西语言接触研究的学者共同申请的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基地(ICIS)的计划获得日本文部科学省的批准。同年10月的成立大会上,余英时(Yu Ying-shih, 1930—)教授在主题报告中精辟地论述了汤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和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 1927—2008)的文明论,并指出文化交涉学的建构以及为了推动相关研究而设立的东亚文化交涉学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2009年6月,东亚文化交涉学会(Society for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 SCIEA)正式在日本大阪成立。学会的宗旨是为了对东亚内部文化的形成、接触、冲突、变迁、融合等现象进行动态的把握,并且综合多种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对文化交涉的形态进行多方位的阐释,以推动东亚各国学者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为目的。

<sup>①</sup> 盖耶、布莱特著《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历史》,载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2—202页,此处见第186—197页。

在学术研究方面,团队学者主张,应力求研究活动拥有全球化视野和创造性。学会虽然将研究对象设定在“东亚的文化交涉”上,但也包括“东亚范围内的东西文化交涉”和“东亚各地域间的文化交涉”两方面。同时在对该文化交涉的实际特征进行分析时,将超越、突破两个国家或两个地域之间的所谓“一对一”研究的局限,尽可能地灵活运用多国间或者多地域间的“多对多”研究的方法。那种以国家、文明或陆地空间为标准的地域划分,并不能构成今天学者研究的界限。<sup>①</sup>

### 三

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人文学科的整合研究,已经成为趋势。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历史学“全球转向”(global turn)展现了作为全球史观和研究对象的全球史:前者是一种历史研究及历史书写的新视角、新方法,从整体观和联系观来编纂宏观世界史或考察微观个案,或者以超越民族国家的视野来看待一些跨国历史现象;而后者则是研究领域和历史学分支学科——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历史研究。全球史和东亚文化交涉学希冀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以整体观的大视野,将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相互关系情景之中来予以理解和考察,突破以往人类认识的各种中心主义偏见。“全球史与东亚文化交涉研究丛书”(Studies of Global History &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计划收录以上述背景为研究立场和方法的全球史和东亚文化交涉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从根本上来讲,全球史与文化交涉所强调的是全球范围内的互动。“全球史与东亚文化交涉研究丛书”所涉及的内容,实际上是对大航海以来东亚与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人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所形成的互动情况的考察。除了通史性、区域性全球史与东亚文化交涉的著作外,这套丛书也涵盖世界与东亚文化的专题性研究,其中包括:贸易史、移民史、传教史、语言交流史、知识迁移史、科技史、疾病史、概念史、翻译史、留学史等内容。之所以有这些专题,是与法国年鉴学派所倡导的“问题史学”相关的,年鉴学派强调“分析”、“提问”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

<sup>①</sup> 如贝利爵士(Sir Christopher Alan Bayly, 1945—2015)著《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的副标题“全球互动与比较”(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所示。Christopher Bayl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 - 1914: 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刘新成列出了西方全球史学者所表达的互动模式的八种形式：1. 阐述不同人群“相遇”后，文化影响的相互性和双向性；2. 描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或“共生圈”；3. 论述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发明创造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4. 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5. “地方史全球化”；6. 全球范围的专题比较研究；7. 生态史、环境史研究；8. 探讨互动规律与归宿。<sup>①</sup> 上述全球史与东亚的专题都可以归纳到刘新成所列的互动模式之中。美国历史学家本特利(Jerry H. Bentley, 1949—2012)就认为世界史(全球史)所考察的是“超越了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等界限的历史进程。这些历史进程已对跨地区、大洲、半球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事物都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气候变迁、物种迁移、传染病蔓延、大规模移民、技术传播、帝国扩张的军事活动、跨文化贸易、各种思想观念的传播以及各种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延展”<sup>②</sup>。东亚的文化发展的历史，是既有自己的独特传统，同时也通过东亚内部以及与世界的交流和互动而不断创新和突破的历史。正是通过全球史与东亚文化交涉的研究，才能看到今天的东亚文明是与不同文化交流的结果，并揭示出东亚文化的全球性意义。

这套丛书所关注的是大航海以来的欧洲与东亚的文化交流，即便涉及古代东亚历史、思想、宗教、文化的内容，也是在西学思潮影响之下的再阐释或重构。东亚思想由于脱离了原有的情景和脉络，在新的语境中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新的阐释和理解。任何思想都有其滋生和发展的社会和学术土壤，这一土壤发生变化显然会产生“橘枳之变”。任何的问题意识都是基于时代和环境的刺激而生发出来的思考。正是由于融入了本国文化的脉络和情境，原本陌生的思想、概念在新的脉络下重新变得鲜活起来，继而起着重要的作用。西方学者对东亚的很多研究都将东亚文化带入到他们的语境之中，这便意味着，经过这些学者们的努力，东亚文化超越了其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时空，获得了另外的价值。

现由中日两所高校研究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与关西大学东亚文化交涉研究院——携手合作推出系列丛书，目的是推动上述领域的成果出版，侧重方法论上的探索，促进学术资源的共享。入选的书稿计划在中日两国同时出版，有日文也有中文著作，在于突显东亚文明形态的多元性特征。罗马时代的思

<sup>①</sup> 刘新成撰《在互动中建构世界历史》，载《光明日报》2009年2月17日。

<sup>②</sup> 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5页。

想家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 4—65)在《道德书简》(*Epistulae morales*)中谈到哲学时说: Non in verbis, sed in rebus est. (Ep. 16) 意思是说, 哲学不在于耍嘴皮子, 而在于实际行动。我们希望“全球史与东亚文化交涉研究丛书”能真正为东亚的学术界带来一些改变。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李雪涛

关西大学教授 沈国威

2016年岁末于北京/大阪

**第一章****汉语与二字词 / 1**

- 第一节 我们为什么需要二字词? / 1  
第二节 现代汉语的二字词来自何处? / 26  
第三节 本书概述 / 44

**第二章****来自翻译史的启示 / 47**

- 第一节 佛经译词与二字词 / 49  
第二节 日本兰学译词与二字词 / 55  
第三节 造字为词: 来华传教士如何创造译词? / 64  
第四节 单字抑或复辞: 严复与梁启超的争论 / 79

**第三章****近代书写语言的形成与二字词 / 91**

- 第一节 文之类别与二字词 / 92  
第二节 《辞源》的时代: 由单字到复辞 / 105

**第四章****基本词汇的近代形成 / 116**

- 第一节 基本词汇与二字词 / 116  
第二节 日本的基本词汇化研究 / 119  
第三节 概念范畴及原型理论 / 125  
第四节 基本词汇化的研究指向 / 136

## 第五章

### 近代二字词环流与日语影响 / 145

第一节 日语借形词 / 145

第二节 日语借义词 / 180

第三节 日语激活词 / 229

## 第六章

### 现代汉语二字词词源概览 / 237

第一节 词源调查文献群与目标词的确定 / 237

第二节 现代汉语二字词中的古典词 / 240

第三节 现代汉语二字词中的传教士译词 / 255

第四节 现代汉语二字词中的本土文献词 / 261

第五节 现代汉语二字词中的日语影响词 / 261

## 结语

### 二字词与汉语的近代演化 / 284

参考文献 / 291

索引条目 / 308

后记 / 311

# 第一章 汉语与二字词

我们首先对本书的书名略作说明。本书的“近代”与汉语史研究的断代不同，主要指 19 世纪。笔者认为，19 世纪是前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演化的重要时期。至于“二字词”，汉语史研究中多称“复音词”，词汇研究的专书、论文也称“双音词”或“双音节词”。本书除了引用外，一般使用“二字词”这一术语。<sup>①</sup>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音节”一词作为语音学的术语使用是在 20 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直至“五四”期间，讨论此问题只用“字”，而不用“音节”。二、与汉语不同，在日语、朝鲜语里，汉字和音节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本书所讨论的二字词化问题同时也是东亚汉字文化圈其他语言所存在的现象，这也正是下文标题中“我们”的意义所在。本书讨论的二字词化所涉及的二字词，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类是名词，主要表示新出现的事与物，这是社会发展、科学进步的结果；另一类是同义词群内的新增成员，虽然有大量的名词，但更主要的是现代话语叙述行为得以成立的动词和形容词。前者是社会史、科学史、概念史乃至所有冠以“近代”的学术史研究的对象，笔者从近代中日词汇交流史的视角，对此也有所探讨（参见书末参考文献）；后者是近代书写语言成立及言文一致相关研究的对象。就现状而言，研究成果还显薄弱，而本书的重点毋宁是后者。

## 第一节 我们为什么需要二字词？

现代汉语是从 19 世纪以前的近代汉语发展而来的，其基本架构在直至 1919 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完成过程中，词汇体系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词语的

<sup>①</sup> 日语称「二字語」。现代汉语中，含有“-儿”的词虽然是二字，但表示的是一个音节。不过这对本书并无实质性的影响，因为本书的考察对象主要是 19 世纪以来的新词、译词、抽象词汇，以及“突然”活跃起来的二字动词、形容词。另外，由于众所周知的理由，本书的二字词亦不包括联绵词和音译词。

二数字化。二数字化不仅仅限于词汇的层面,同时作为横跨语法、文体的现象,赋予了汉语最显著的近代特征。词汇的二数字化为汉语带来了以下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

1. 谓词体词之间得以实现词性转换;
2. 促进了词缀及类似成分的发达;
3. 二字形式动词“进行、给予、受到、开始、结束、引起……”<sup>①</sup>,复合介词“关于、对于、基于、由于……”等的频繁使用改变了汉语传统的句子结构,促进了定语修饰部的复杂化;
4. 二字词形式为学术用语体系的建构准备了必要条件;<sup>②</sup>
5. 二字词提供了大量同义词、近义词,提高了汉语的表达性、描写性和精密性;
6. 促成了基于言文一致的科学叙事的实现。<sup>③</sup>

汉语词汇的二数字化早在先秦已经初现端倪,晋唐的佛经翻译大大地促进了二字词的产生;始于16世纪末的耶稣会士的西书翻译,尤其是进入19世纪以后,新教传教士主导的宗教的,或者世俗书籍的翻译以及汉外辞典的编纂,都催生了大量的二字词;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汉译日本书的影响下,二字词数量再次空前增长,最终奠定了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基本格局。<sup>④</sup>二字词既然是现代汉语的重要特征之一,其发生的诱因、成词机制及形成的历史等就都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前辈学者如王力、吕叔湘等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指出了词汇二数字化的问题;50

① 所谓“形式动词”是指那些实义弱化,主要以动名词为宾语的词。

② 本书的“学术用语”与所谓的“科技术语”不完全相同。后者一般指科学技术的专业名词,即 technical term,而前者,即笔者所意图的是指进行近代科学——人文的或自然的——叙事所需要的所有词语,包括动词和形容词。

③ 关于“言文一致”,笔者认为其本质不是“我手写我口”,即将有声语言转换成文字,而是能够听懂的文章,即可以将视觉映象转换成听觉映象的文章。其主要内容与其说是小说,毋宁是自然或人文的科学。参见本书“结语”。

④ 现代汉语以二字词为主已成定论。二字词在《现代汉语常用词表》(商务印书馆,2008)中占总词汇量56008词的72%(40351词),一字词仅为5.7%(3181词);为外国汉语学习者准备的词汇表《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改定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中二字词占总词汇量8822词的72.5%(6400词),一字词为21.9%(1931词);在《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国家标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0)中二字词占总词汇量11092词的75.6%(8390词),一字词为15.1%(1675词)。不同的词表对一字词的认定标准不同,但作为总体倾向,笔者认为有统计过宽之嫌。根据笔者的统计,现代汉语中一字词的数量在1200左右(远远小于上述3种文献),现代汉语中一字词可以看作一个稳定的常数,所以分母越大,一字词所占的百分比也越小。

年代,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后,词汇二文化现象已成为学术界持续性的关注点,研究成果大量涌现。<sup>①</sup> 笔者近年的学术兴趣在于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东亚汉字文化圈各国的国语建构及其相互之间的影响关系在词语层面的各种反映,本书就是从语言接触、词汇交流的视角考察、解明现代汉语词汇二文化现象及其机理的一种尝试,也是笔者近期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 一、汉语的演化与二字词

汉语为什么会发生词汇的二文化现象? 最常见的答案是词汇二文化符合汉语发展的大趋势。王力指出:“汉语构词法的发展是循着单音词到复音词的道路前进的。”<sup>②</sup> 这也就是说,由一字词到二字词的变化是汉语“进化”的必然结果。<sup>③</sup>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是汉语二字词发生的一个高潮期,同时也是进化论学说在中国广泛流行的时期。人们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随着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力度的增加,新的事/物的不断产生,人类知识水平、认知能力的逐步提高,知识积累出现了飞跃,语言作为人类活动的交际工具也需同步发展。以汉语而言,中国社会的进步要求汉语在表达内容和交流方式上也随之发生变化,反映到词汇上就是二字词的大量增加。总而言之,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语言及其词汇也需要与时俱进。

最早从汉语历时“发展”的角度讨论二字词问题的是留学日本东京大学博言

① 近期专著管见所及就有伍宗文著《先秦汉语复音词研究》(巴蜀书社,2001)、程湘清著《汉语史专书复音词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董秀芳著《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商务印书馆,初版2002,修订本2011)等,研究论文更是数以百千计。朱庆之、梁晓虹等的汉译佛经译词研究中有相关章节讨论二字词的形成问题,如朱庆之著《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梁晓虹著《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颜茂荪著《佛教语言阐释——中古佛经词汇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等。此外,在关于现代汉语形成、欧化语法的研究中,词汇的二文化现象也是一个重要的考察内容。

② 王力著《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40页。董秀芳说:“从以单音词为主过渡到以双音词为主,这是汉语内部的一个发展趋势(这一点已被高本汉、王力以来很多研究古汉语的学者注意到,并已成为汉语语言学界的共识)。”参见董秀芳著《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0页。

③ 除了下文的胡以鲁以外,胡适也是用“进化”一词系统地讨论汉语的近代演化问题的重要研究者。胡适说:“单音字变成复音字,乃是中国语言的一大进化。”(胡适撰《国语的进化》,载《新青年》第7卷第3号,1920年2月1日,第7页)参见沈国威撰《“形式”与“精神”的拮抗——重读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一)》,《東アジア文化交渉》2013年第6号,第43—55页。

科、师从日本国语学家上田万年,并且与章太炎有着师承关系的胡以鲁。<sup>①</sup> 胡以鲁由日本回国后出版了一本被认为是第一部以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框架研究记述汉语的著作:《国语学草创》(1913)。《国语学草创》初印本几不流传,现在能看到的是商务印书馆于1923年5月出版的重印本。刊登在《申报》上的广告词称:

《国语学草创》:一册 四角五分

胡以鲁著 本书为日本帝国大文学士定海胡以鲁氏之遗著。胡君湛深语学,于二十年前首先讨论国语问题,实为国语书中第一部之创作。章太炎先生序文有“本之心术,比之调律,综之例证,证之常言,精微毕输,黄中通理”等语,推重甚至。惟坊间印本甚少,不易购得。版权自归本馆后,兹为第一次印行。研究中国语言学者不可不读此书。<sup>②</sup>

由此可知,胡以鲁去世之后其著作版权移至商务印书馆,由该馆重新出版。<sup>③</sup> 其实最早刊登该书消息的是北京的《新青年》杂志,《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的“书报介绍”栏对胡以鲁的《国语学草创》有如下详细介绍:

书凡十一篇。(1)论纲。(2)说国语缘起。(3)国语缘起心理观。(4)说国语后天发展。(5)国语后天发展心理观。(6)国语成立之法则。(7)国语在语言学上之位置。(8)论方言及方音。(9)论标准语及标准读音。(10)论国语国文之关系。(11)论译名。“论译名”一篇,印书时未曾脱稿,别载癸丑甲寅间《庸言报》中。(?)胡君留学日本帝国大学,专心研求各国古今语言文字,以为创造中华新国语之准备。不幸早世,致民国失一优秀人物,甚可惜也。是编所论,既不同于迂儒高远难行之说,尤非情钟势耀之流,专欲以

① 胡以鲁(1888—1917),字仰曾,浙江省宁波定海人。先在日本大学学习法政,获法学学士学位;后入日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笔者注)博言科攻读语言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在日期间亦师从章炳麟。胡氏回国后,历任浙江高等学校教务长等教育行政方面的职务,1914年转入北京大学讲授语言学课程,1917年英年早逝。近日,东京大学文学部大西克也教授找到了与胡以鲁相关的两件珍贵资料,厦门大学李无未教授据此断定胡以鲁为宁波府定海厅人,生于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1888年11月28日),其父胡耀。胡以鲁的入学保证人为鸠山秀夫,日本著名法学家与律师,具保日期为明治四十二年九月十六日(1909年9月16日)。笔者衷心感谢二位教授惠赐资料及卓见。

② 《申报》第18107号(1923年7月25日)3面。按,文中的“二十年前”应为“十年前”之误。

③ 最近又见山西人民出版社推出《国语学草创》复刻版(2014)。时隔百余年,胡以鲁遗著得以再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功德无量。当然复刻本如能有解题、导读一类则更好。关于《国语学草创》,另有关西大学博士——海晓芳的专著《文法草创期中国人的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可供参考。

北京方音为中华国语者，所可同年而语。书中要点，略具于章太炎先生之序中，今录如次。章氏曰：<sup>①</sup>

“仰曾（胡君字）之言曰。中夏幅员辽阔，方语不能无小殊，犹南欧诸国同出罗甸，而言音往往别异，不失同归之道。所以发扬国语之长者曰，语言之成，无过‘综合’、‘分析’二端。以综合成名者，希腊、印度为最上。以分析成名者，惟中国为完备，西方英语亦近焉。故他国所云‘三性’，涉于宗教迷妄者，中国皆能廓清无余。其长一也。

婴儿之语，先动词，复名词，盖客体先现而主观次之，有从此例以成排列者，其语言皆非进化者也。上世国语，亦有次第颠倒者，若云‘室于怒，市于色’，‘野于饮食’，汉魏以来，涤除殆尽，而他国皆不能比。其长二也。

即音而存义者，地逾十度，时越十世，其意难知也。即形而存义者，虽地隔胡越，时异古今，其文可诵也。夫夏人之性，以保守名，然语言文字，赖此形象不易，得以通达，翻译训故皆省焉。不齐而理，至繁而简。其长三也。

若夫音以表言，言以达意，舍声音而为语言文字者，天下无有，宙合之文，皆谐声矣，虽中国固不能出此类例，是以六书牖陈，而谐声者什有七八。或云中国字皆象形，斯则诬妄之论已。”

（章氏）又曰：

“古之正音存于域中者，洋洋乎其惟江汉大鄂之风。其侵谈闭口音，宜取广东音补苴之，异时经纬水陆之交凑于汉上，语音旁达，天下为公。今者考文正读，宜逆计是以为型范。斯余畴昔所持论，而仰曾亦有取焉。”

观此所述，可以知是书之价值矣。胡君又谓，“苟教育普及，一般知文词之适用，而大思想家、大文豪如德意志加堆氏 Goethe、西来而氏 Shiller，其人者更起其间，以古语补今语之不足，以古语防外语之侵入，自成纯粹国民之文学，定言文一致之国语，此吾辈之所馨香祷祝者也。然是既不可旦暮遇，而谋教育之普及，又非从来国文所能奏其效。故吾辈权拟偶近于语言之‘质文’，以应义务教育之实用。”因定“质文建设案”，略谓质文应用文字，约二千字已足，定以今义，及今义应属之词品，与今语一般之语法，编为教科书。凡繁缚之称

<sup>①</sup> 章太炎“国语学草创序”署“民国二年一月”（1913年1月）所引章氏序言根据《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63—464页）进行分段，引文中的误植亦径直改正，不再一一注出。

呼,(如足下,阁下,执事,等)无谓之区别,(如崩,薨,卒,不禄,等),但取常用之一,而废其余。陈语古典,概废不用。实字虚字,皆取言文相近者用之,

国音之须制定,国语之须创造,皆今日至要之务。而于言文一致之先,制作近语之文,以为过渡时代之用,藉以驱除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之毒焰,尤为刻不容缓之举。胡君此书,陈义甚正,大足供参考之资。<sup>①</sup>

推介文称胡以鲁“不幸早世”,可知1917年5月1日前胡氏已经去世。<sup>②</sup>推介文大段引用章太炎的序言,对胡氏的著作评价极高。其实章氏的序言中还有:

而仰曾综贯大秦驴唇之书,时时从余讲论,独有会悟。<sup>③</sup>今见其书,乃为比合音理,别其弇舒,音有难喻,以珊斯克利及罗甸文参伍相征,令古今华裔之声,奄然和会,斯治语学者所未有也。……余闻之,伟其比较中外,密粟邃深,以为江、戴、钱、孔诸儒亦既运而往矣。今异域交通,殊语瑰音,粲然毕效,继是以后,殚精穷贯,以为国语扬灵舒光者,非仰曾谁与赖焉?

等语,对胡以鲁的学识极为赞赏。《新青年》推介文最后两段更是谈及胡氏著作在以言文一致为特点的新国语建构的进程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如何建立新国语是当时《新青年》上学术讨论的一个主要内容,同一期上还刊登了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胡适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等论文,均为新国语问题的重要文献。从《新青年》的推介可知,初版本于其时已(少量?)印行。不过1923年刊行的商务印书馆版(以下简称“商务版”)中并没有第一篇《论纲》(只有章太炎的序言),商务版中作为附录所收的《论译名》在初版刊行时也尚未收录。

继《新青年》之后,《大公报》也在1918年12月1日对胡著加以介绍: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胡君为章太炎先生高足,曾留学日本,通英德日三国文。是书本言语学原理,博征各国语言,上探我国古音韵及经小学源流,原原本本为我国学术界放一大异彩,为将来国语学者之光导。论者谓其书价值尤在马氏文通之上,洵不诬也。)<sup>④</sup>

① 见《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② 《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3月1日)所载钱玄同致陈独秀信中已有“亡友胡仰曾君”的文字。

③ “大秦驴唇之书”即梵语、西方语言关于音韵学的书籍。胡以鲁“时时”与章太炎“讲论”,应该向章提供了相关知识。但两人的师承交流,不明之处甚多。章氏在日本的活动记录中也没有发现与胡以鲁相关的记述。

④ 见《大公报》0626号,1918年12月1日。标点为引用者所加。